

韦延年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火

江
南
風
景
名
勝
集

日
出
江
上
紅
暉

火
燒
江
水

綠
林
日
照
山



卷首语

我国的古典诗词，上自三百篇，下迄明、清，数量十分繁富，质量也代有上乘之作，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我们珍视的诗歌遗产。

时代在前进，生活和语言在发展，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化在飞跃，国际间的文化在交流，在融汇，作为古诗词的后继者的白话诗，已成为诗坛的主导，在这些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能从古诗词学点什么呢？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古诗词给读者以强烈印象的，首先是它的巨大的认识价值。

我国的壮丽河山，名胜古迹，风物人情，许许多多已为我们历代的诗人词客所讴歌，所咏叹。经过他们的艺术点染，它们便被赋予了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活的灵魂，诱发出巨大的魅力，人们常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有若干古典诗词娴熟于心，那就会大大提高自己对祖国锦绣山河

的欣赏水平，增进对社会人情甚至人生的理解能力。比如，你有机会打从苏州的寒山寺经过，你就会油然想起张继的那首《枫桥夜泊》来。那怕正当丽日经天，可是一种更深人静，枫叶瑟瑟，渔火依偎、钟声悠然的情景，会进入你的想象，使你直味着诗中所描摹的那种令人沉醉的恬静美。又比如，当你面对着浊浪滔天的黄河时，难免会想起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名句。这时你除了觉得他十分形象又十分风韵地写出了黄河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外，也许由此感悟到时势推移的必然和人生的可贵，从而有所激励于心，奋勉上进，要创造一番事业。

社会人情的幽微显隐，古诗词尤能曲尽其妙。如我们读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老人那种慷慨御侮但又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不是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么？又如李商隐的抒情名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它触动了多少儿女的心灵？人间那种刻骨的相思，不是纤毫不爽地传达出来了么？

显而易见，古诗词的薰陶，大大地丰富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

古诗词的音律美，是我们读古诗词时的又一强烈印象。可以说，古诗词的巨大魅力，部分在于它的音律美。许多只

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少年，都喜欢涉猎唐诗宋词，背诵其中的若干篇章。他们对内容并不完全理解，但这不妨碍他们的热爱。一些青年读者，甚至由于一时难以索解而锲而不舍。

青少年读古诗词，一般从绝句、律诗、小令入手。这类形式的诗词，音律优美，容易上口成诵，近似于民歌，可以咏唱，也耐吟哦。在唐代，部分绝句诗还取代乐府诗而布入管弦，为许多专业歌手所弹唱。今天青少年的喜读唐诗宋词，其原因之一，也由于诗词的音律美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吸引着人们去接近它、把握它和探索它。许多为人们传诵的佳什名篇，音律和内容往往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青少年对古诗词的爱好，并不限于那些流行的、音律较整齐短小的绝句、律诗和小令，对于若干古乐府、歌行和长调的词也有兴趣。比如李白的《蜀道难》，形式十分奇特，句子从四字、五字、七字到九字，交相错杂，读起来佶屈聱牙，可是仍拥有广大的读者。此中原因，除内容对蜀道的险峻崎岖极尽描摹的能事外，它的音律与内容也非常谐合。佶屈聱牙中别有一种耐人咀嚼的韵味。因而不仅不成为阅读的障碍，还是一种诱惑，它叫你读它时既要耐着性子但又不是毫无兴味，使你以能读熟它大体上把握它为快。这个例子说明，古诗词的音律美是它的一种本质属性。在白话诗盛行的今天，古诗词仍拥有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众多读者，并不是偶然的。它的音律美，就象我们的民族乐器那样，以自己的民族特色吸引着广大的读者，而若干外国人也被纳入这个读者群中。

我们读古诗词，还常常惊异它的不少作者对历史知识所作的高超的艺术表达。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一经诗

人词客的笔触，就以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震撼着人心，起着巨大的历史的批判作用。如我们读杜牧的《华清宫》：

新丰绿树起黄埃
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
舞破中原始下来

天宝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腐朽统治和荒淫生活的历史画卷，一下子展现在我们面前。诗的最后一句，其讽刺的辛辣，尤入木三分。又如杜甫的《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 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 遗恨失吞吴

这首小诗高度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和高明的战略思想，而且是那样地风韵，使奉节县南长江边上的这一古迹更加生色，更具魅力。又如章碣的《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元来不读书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的一项迫害知识分子和愚民的政策。章诗揭示了这一政权之所以崩溃，其根本原因在于秦皇的暴政，是暴政激怒了人民，特别是农民。二十八字的小诗，竟然把一场非常的历史变革写得那么真实而生动。诗歌的艺术功用，是正史所不能取代的。人们读这类诗有如读史，既得到艺术的享受，又获得相应的历史知识。这种收获，诗歌之

外是难于找到的。

古诗词艺术语言的多样性和概括性，也是非常突出的。许多大家、名家，都注意向人民学习语言。他们不仅把口语、方言、外来语入诗，还把经史子集的文句入诗，重视对诗歌语言的提炼。因此，古诗词的语言是丰富多采的，生动活泼的，高度概括的，富于感染力的。如李白的：“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川。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秋浦歌》）四句诗明白如话，象是一幅淡雅的素描。“耐可”（能可）是吴地方言，他运用到诗中是那样的协调，读来非常自然。又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已成为古今中外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一针见血的写照，可说是诗语概括的典范。南宋杨万里还用虫声鸟语入诗：“独树秋筠倒晚壶，喜无吏舍四歌呼。柳梢一壳兹 缙淳，屋角双斑谷古孤”。（《初秋戏作山居杂兴俳体十二解》）读者居然从诗中听到了知了和斑鸠的鸣叫，这是多么的新鲜呵！韩愈是号称“以文为诗”的代表性诗人。他把散文句子化入诗歌，形成了一种迥异寻常的拗峭雄放的风格，极富骨力。李白、杜甫、卢仝、苏轼等人的部分篇章，也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特色。这种风格虽不为诗人们普遍地接受，但却是拓宽诗歌语言的一种实践，是值得肯定的。

古诗词许多丰富、精彩的艺术语言，部分已融合到人民的语汇中，从质和量上充实了我们民族语言的宝库。

古诗词的作者们在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可说很多。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就是这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离骚》是一部以浪漫主义为其特征的伟大诗篇。它的浪漫主义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从本质上区别于无根的夸饰的诗作。那些徒有浪漫的词藻、意境和形式的诗歌，是结不出类似《离骚》的现实之果来的。李白的浪漫主义虽然充分体现了理想和个性的追求，从表现的手法看，它那种凌空蹈海、飘举欲仙的艺术美，确实令人仰想，叫人目炫，至今似乎还无人超过。但从内容看，它腾越、张扬的基础，比起《离骚》来，不免要狭窄、淡薄些，这就多少有逊于屈原。同是浪漫主义，其间的色泽、分量，依然有轻重浓淡之分。

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人们谈论的多了。只要熟读他们的代表性的篇章，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秦中吟》等讽谕诗章，他们的至今还可借鉴的现实主义特色，就会了然于心的。

我国的古典诗词浩如烟海，光是两千多家作品的总集《全唐诗》，就够人们“皓首穷经”的了。这些形同古董而实非古董的古典诗词，如果我们下一番学习或研究的功夫，我想，它会成为我们民族诗歌的母乳，大大有助于我们今天的诗歌（白话诗和旧体诗）的健康发展的。要成为诗歌的巨人，母乳怕是不能缺少的吧。

前人把诗歌这门艺术比拟作“神龙”，可谓善于着词。传说中的“神龙”，以其变化莫测和神通广大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着崇高的地位。诗歌呢，从它的内容、风格、形式到各种流派，不也是非常的繁富、奥秘和纷杂么？“神龙”按说是“见首不见尾”，很少有人见其全体的。同样，能通窥诗歌的底蕴的，古往今来，不能说没有，但为数恐怕不多吧。作

为一位诗歌的业余爱好者，在阅读中随手记下的星星点点，充其量，也不过是对这位“神龙”一鳞一爪之见。其中的若干理解、提问或设想甚至可能是天真、外行及可笑的。好在今天倡导“百家争鸣”，何妨“姑妄言之”，也许由此引出方家的珠玉来也不一定。

这小册子里的一百则读诗漫记，主要写于“文革”期间。原来打算加以充实后整理成若干专文，但时过境迁，兴味淡薄了，在出版社同志的支持下，就以这种“杂碎”的形式呈送给读者，显得有点不恭。在写作和整理成集时，可供参考的资料很少，加上本人诗学无甚根底，在事实、引文和观点等方面，错误肯定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作 者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南宁

《古诗十九首》曾经是前人论诗的标准之一，被认为是古诗的经典著作，为后人所不能企及。有些人把它和“三百篇”并提，六朝许多人曾竞相拟作，可见影响之大。

《古诗十九首》的主题，不外乎儿女朋友间的悲欢离合，感叹人世无常，惆怅年华易逝，倡导及时行乐。它的最大特色是感情淳朴。如《冉冉孤生竹》，它这样刻画那位久等丈夫不至的新嫁娘的心情：“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逐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可谓伤而不怨，与后世相比，显然是敦厚多了。

语言的朴素，则是“十九首”的另一特色。如《客从远方来》，是写一位收受远方友人“一端绮”后的感情，只用普普通通的四句话：“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就把主人公真实而深厚的感情传达出来了。

采用比兴的手法来摹写人情，则是“十九首”的又一特色。如《涉江采芙蓉》，从芙蓉、芳草起兴，想到远别情人无由会聚而发生离居的感叹。这种触景生情的表现手法，很容易唤起读者的共鸣。这些特色，也许是构成“十九首”古色斑斓，如同出土的青铜器，在后人眼中特别珍贵的缘故吧。

在“十九首”中，真正情真、意远、词丽，内容与形式达到完全和谐的篇章，也不过十一、二首。其余几首，不能说白璧无瑕。如《青青河畔草》，词意平平，在“十九首”中是下乘之作。《青青陵上柏》，起兴两句与后边的叙事全无钩

连，叙事亦杂沓，拼凑成章。《孟冬寒气至》，前六句与后八句毫无干系，可能是抄录者随手骈联所致。如拆开来，让“客从远方来”以后几句独立成章，倒是值得一咏的佳什。《去者日已远》、《生年不满百》等首，无论词和意，都无足称之处。

“十九首”有些篇什很象民歌。如《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等首，一连用迭字，这在文人的作品里是少见的。有些起兴，词意亦大体相同。如《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有如现代为一支曲子谱写的迭词，显然是民歌、乐府的迹象。民歌有这样的特点，在创造出一种格式后，歌手们便按这种现成的格式去进行创作（或叫填写）。虽然有其风韵，然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文人的创作或经文人加工的作品便不同了。如《行行重行行》、《东城高且长》、《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等篇，结构谨严，辞藻简丽，表达的感情也比较细腻、曲折，篇幅也较长。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睇”，这类经过推敲的词句，与旧传李陵、苏武的赠答诗是相当接近的。无疑都是文人的作品。

“十九首”虽然瑕瑜互见，但对后来诗歌的影响，应该承认是很大的，有的人甚至以之为极至，用以衡量后来的诗歌。这种观点，实在偏颇得很。

抒情诗不妨多强调一点诗人的主观情趣；叙事诗则允许

诗人以主、客的身分出现，穿插上自己的议论。“三吏”、“三别”基本上是叙事的，它与抒情的“十九首”不同。“十九首”中若干篇虽然风韵古朴，但艺术手法却未见得高出杜甫。象“石壕”、“新婚”、“垂老”，宛转曲折地摹尽人情，汉魏以来有几个诗人能够企及？时代的精神与题材的性质，决定着诗人的创作，决定着诗歌的情调。唐以后不少诗歌评论家，看不见诗歌长河的发展，以崎岖蜿蜒于青藏高原上的长江源头说成是天下的奇观，对于出峡后汪洋恣肆的长江气势，反认为不足道，所见何其颠倒！

对于封建帝王的骄奢，历代都有讽刺篇章，以东汉梁鸿的《五噫歌》揭露的最深刻：

2

陟彼北邙兮，噫！
顾瞻帝京兮，噫！
宫阙崔嵬兮，噫！
民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全诗只有五句，但所展现的画面却相当广阔而形象。读者试闭上眼睛，沿着诗人指引的思路去想象，不是仿佛见到一位忧愤深沉、目光炯然的诗人，站在北邙山上，默默地眺望着洛阳城中那峨峨如山岳，璀璨若桂府的紫阙，眺望那些工程巨大的陵殿寝宫正交相兴建，而帝都的周遭，则败瓦颓垣，满目凄凉。日月悠悠，何时是个尽头？这一切鲜明的对照，在诗人心中激起怎样的波涛呵！聪明的诗人，以画龙点

睛的手法，对如此沉重而艰难的主题，只写了五句，每句又都不尽言，结尾都付以曼声的一叹。诗人的忧愤因之流化而为江河，变成亘古不尽了！

以最经济的笔墨，为苍生吐无穷的怨愤，《五噫》之外，很难找出第二首。元朝的张养浩，曾写过一首《潼关怀古》：

山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
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
姓苦！亡，百姓苦！

感慨之深，尚可仿佛《五噫》，但韵味之隽永，格调之超逸，却是不及的。

3

曹植的本色是诗人，可是这位“才高八斗”的建安巨匠，却一直醉心政治。曹操未立世子时，据说他曾一度有希望做王位的继承人。后来这顶朱冕被给予乃兄曹丕。丕死后传给其子孙。为了杜绝王位的篡夺，在曹丕还活着的时候，就采取了残酷的措施：先是远封诸弟，继而干脆弑死。曹植也岌岌可危。幸而才思敏捷，两畜之咏，豆萁之歌，脱口而成，免于一死。曹丕之后，身著黄袍的侄子防闲更甚。叔侄、兄弟之间，不仅婚媾不通，连平常的问讯也在禁止之列。“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这简直就是放逐。而封地又一改再改，“岁凡三迁”，疲如奔命。封内的臣民又少，供养不继，连生活也时时发愁。在这样濒于绝望的景况中，诗人却异想天开，上表求用，希望在对外的战争中立功，一展平生抱负。在

《求自试表》中，诗人委婉地说了那么多动听的话：“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这是何等壮烈的表白？“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末光，增辉日月。”这又是何等的谦虚恳切？可愈是这样愈不见用。原因很简单：皇位重于边功。如果让这位有人望的诗人出任将帅，其危险性岂不比蜀、吴大上千百倍？这个道理，不喻自明。然而曹植却忘其所以。结果，不过为后世留下了一纸文采斑斓的表章罢了，于事丝毫无补。

曹植幸而也只做诗人，未遂从戎之志。如果当时竟如所愿，率师征蜀或者伐吴，真不知会落得何等下场？能征惯战的曹休，尚且败于陆逊；深谙韬略的司马懿，累年龟缩于渭滨，甘受巾帼之羞。吴、蜀之师，岂是诗人的笔锋儿拨动得了的！

诗人每不安于本分，好作天马行空之想，宜乎有各种各样的苦头吃呵！

4 我国古代杰出的诗人辈出，诗歌遗产异常丰富，做好整理、注释和科学的评价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训诂和评价，紧密相关，如作品得不到正确的介绍，又如何恰当地论定作者的身份呢？

屹立在六朝诗歌顶峰，风格又十分清新淡远的陶潜，至今尚少正确的评价。历代论者，不是把他说成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人”的代表，就是断言他是失败的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或称道他不愿仕宋，是晋代有骨气的诗人，等等。这都说不上什么公允。

陶潜的伟大，首先表现在他的部分诗篇表达了（虽然是间接地）广大农民对大地主的统治的不满，对自己的理想社会——桃花源的向往。尽管这种理想社会缺乏现实意义，对当时的社会变革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但这个理想社会却与大地主的残酷统治这一现实相对立。因此，这种理想的提出和传播，是对大地主的统治的一种消极的反抗。过高估计或一笔抹杀“桃花源”的社会意义都是不恰当的。

和宣传世外桃源思想呼应的，是陶潜为数较多的关于古圣先贤的篇章。他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这些前哲或安贫守素，不汲汲于名利；或知足常乐，急流勇退；或慷慨悲歌，怒击暴君；或远引让贤，不事虚名；或劳动自给，超然物外；或廉洁自守，不为俗污……诗人有意识地塑造这些高贵的形象，用以反证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贪婪、残暴、淫虐、虚伪、无耻的统治者们的丑恶形象的极端可鄙、可恨、可厌、可耻。诗人用这种鲜明对比的手法来鞭挞眼前的现实，表示对这不合理社会的不满。他的强烈反抗情绪，由于间接的表现方法，常常为后来的读者所忽略而感觉不出来。这是没有把陶诗与所由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咀嚼的缘故。历代许多陶诗的爱好者们，更是从他们的士大夫角度来欣赏，剥尽了它的社会意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个极端歪曲的“溢号”，就是这样给陶潜戴上去的。

陶潜在诗歌创作上的反抗精神，尽管不是直接和露骨的，可是与当时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大地主残酷统治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在客观上是统一的。我们应从这方面去辨识陶诗的人民性。

陶诗中有《述酒》的篇章，隐晦着作者哀晋恶宋的情怀，有些评论家用以论证这是陶潜处世积极性的表现。但这种“积极性”与陶诗前述的人民性毫无瓜葛。司马氏的政权为刘裕的政权所取代，这是大地主阶级内部的统治权之争，与广大人民有何干系？农民还不是照样纳租、服役、剥削、压榨何曾有什么减轻？陶诗入宋不书年号，这和《述酒》一样，在人民看来，亦毫无意义。后世以此抬高陶潜，只能说明千年后的今天，论者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高出当时的陶潜多少。

陶潜出身于寒微的士族，使他在思想上与农民始终有着一定距离；晚年困于饥寒，参加若干劳动，又使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亲近人民；他在宦途上受统治阶级冷淡，不得志，也看不惯政治上的种种黑暗，因而作为一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占着主导的地位。他没有因为一度当县令和做参军而变成流俗的士大夫，这是十分可贵的。从他的诗歌中，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中小地主思想的影子：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桃花源诗

这无论如何不是中小地主的理想。没有地租何成地主？尽管中小地主在政治、经济上受着大地主的打击、排挤和吞并，可是在失去土地和地租之前，中小地主的理想是不可能与农民等同的。因此，与其说陶潜是中小地主的代言人，勿宁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民的代言人。

陶潜的伟大，还在于他的诗歌那种清新、纯真而自然的风格。陶诗感情之真挚，造语之自然，在我国诗歌宝库中可

说是无与伦比的。苏轼说他不是写诗，而是“直抒胸臆”，是十分中肯的。诗虽淡远，却很感人。这是由于诗人袒露了他的肝肠，没有丝毫做作的缘故。如果把唯美派的诗歌和陶诗对比一下，感情的泾渭更其分明。难怪陶诗在千百年来的诗坛上，一直发生着影响，为许多杰出的诗人所师法。

陶潜不是田园诗人，尽管他大半生生活在农村，他的诗歌也有不少篇章是田园生活绝妙的写照，可是他没有把田园绘成天堂，他没有忘情人民，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桃花源”是他的理想，也是农民的理想。如果社会的变革能按照诗人的意志去进行，那么，在陶潜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地主及其极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存在的。因此，就全人而论，陶潜是一位志在苍生的人道主义者。他和那些满足于田园丘壑川谷之美，完全寄情于花香蝶影的那类以田园为天地的诗人，极少相似之处。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他的诗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社会生活，而不能成为诗史，终逊杜甫一筹。

5 颜延之、谢灵运的诗文，在刘宋时代，评价很高。谢灵运的诗，甚至影响当代的诗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不甚为人注目的陶诗，却日益显出异彩，把颜、谢远远地抛到后面。时间与人民作了最公正的选择。

读颜延之的《陶徵士诔》，再读陶潜的祭妹、祭从弟文和自祭文，两者的风格迥然不同。颜氏的“诔”，古奥雕饰过甚，味同嚼蜡；陶氏的祭文则“省净”感人。悼者的情愫，死者

的行状，都自然流露。二者的文体虽略有别，但质量却有高下之分。在“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时代，颜文自然见重于庙堂。但对死者和人民却是无足轻重的。试想，如果颜氏不镂金蜡采地写那么一篇不痛不痒的“诔”，而是实实在在有头有尾地写一篇“陶传”，岂不大有功于死者和后世？陶氏生前，颜氏和他那样情款，对于这位幽栖不仕的友人的言论、事迹，不待说是很熟悉的。倘能形诸于文，岂不比后来的萧统的“传”来得翔实可信？可是颜氏却醉心于写那样一篇可有可无的“诔”，实在使人感到可惜。说来这也不奇怪，在颜氏的眼里，这位自愿去官的彭泽令，不过是清高绝俗、安贫守素的“靖节徵士”罢了，并不是什么旷代逸才、卓绝时辈的诗人。这从颜氏所写的“诔”里可以得到说明。

可以算得比较知音的，倒是一个世纪后的萧统。你看他写的陶传，何等亲切。他不仅同情陶潜的身世，而且特别赏识他的诗文。这就高出颜氏许多。同时而不见重于后生，知音而俟诸异代，象陶潜这样，历代不知有多少。真是也幸也不幸呵！

在唐诗这条银河中，绝句是最灿烂的星群之一。
6 李白的绝句，在这个星群中又占着最光辉的地位。在他留存下来的一百三十多首绝句中，多数闪烁着独特的艺术光彩。那些咏山水之作，简直就是一幅幅出神入化的山水彩画。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好个“青天削出金芙蓉”！它把五老峰晚照中的形象摹写得何等瑰丽。人们再